

【1994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年度研究课题】

贵州文艺

现状及发展态势

研究

贵州省文联课题组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1995.1 印

导 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明建设，一是精神文明建设，仅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后果必将是十分严重的。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转轨，两种体制并存，市场还很不规范。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重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文艺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有的作用更是别的部门所无法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都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文艺亦不例外，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由此而带来的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的社会作用，对上层建筑学说等问题的简单理解，对艺术家自身思想观念、学识素养的束缚，等等，都是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经济领域中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想的影响，所有这些反映到文艺上来，也必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我们贵州文艺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十分有必要把贵州文艺的现状做认真的考察，分析其中主要文艺门类各自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些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本课题将从贵州的文学、造型艺术、综合艺术、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以及贵州文艺发展面临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贵 州 的 文 学

我们正处于一个风云翻滚的世纪将结束、蕴含无限希望的新纪元即将来临的时代。在这新旧撞击、承前启后的时代，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特定时代心灵轨迹的艺术的反映，而且应该体现对未来进程的饱含哲理的思考。总之，时代的大背景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贵州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概莫能外，而地理环境制约物质文明的程度，创作主体的秉赋又使得贵州文学在具体运作上存在着多种可能。如何发展贵州文学，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必要的回顾

贵州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队伍，由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如邢立斌等）、原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如蹇先艾等）以及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所组成。建国以前，贵州作家在全国文坛具有影响的仅谢六逸、蹇先艾二人。解放后，这种状况并无太大的改变。可以说，五、六十年代，贵州文坛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作家及作品似仅有两例：一是石果五十年代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二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集体创作的形式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挡不住的洪流》。石果的作品，至今仍具有别人之作难以替代的文学价值，因为它是厚实生活的土壤中绽放的心智结晶。而后一例作品，简略地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民主革命时期麻山、瑶山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二是合作化运动中的“两山”风情，三是“大跃进”的“两山”颂歌。今天看来，正是第一部分的作品以传奇性、地域的奇异性及民族风情使得它今天仍具有文学的价值。第二部分艺术水准平平，实在也因为描写合作化的成功之作颇多，而第三部分则是文学赝品，就在它鼓吹差不多进入共产主义的地方，今天正靠各地支援度贫。这其中的经验是值得贵州文学界认真吸取的。

六十年代初期，贵州文学也有过短暂的活跃，但并未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以后很快就运动频仍，文学创作出现断档。至于

导 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文明建设，一是精神文明建设，仅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后果必将是十分严重的。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转轨，两种体制并存，市场还很不规范。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重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文艺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有的作用更是别的部门所无法替代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生，都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文艺亦不例外，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由此而带来的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文艺的社会作用、对上层建筑学说等问题的简单理解，对艺术家自身思想观念、学识素养的束缚，等等，都是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经济领域中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想的影响，所有这些反映到文艺上来，也必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贵州，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我们贵州文艺的发展，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十分有必要把贵州文艺的现状做认真的考察，分析其中主要文艺门类各自拥有的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些解决问题、促进发展的思路 and 对策。

本课题将从贵州的文学、造型艺术、综合艺术、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以及贵州文艺发展面临的几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贵州的文学

我们正处于一个风云翻滚的世纪将结束、蕴含无限希望的新纪元即将来临的时代。在这新旧撞击、承前启后的时代，从事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一种幸运。当然，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对特定时代心灵轨迹的艺术的反映，而且应该体现对未来进程的饱含哲理的思考。总之，时代的大背景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走向，贵州的文学创作自然也概莫能外，而地理环境制约物质文明的程度，创作主体的秉赋又使得贵州文学在具体运作上存在着多种可能。如何发展贵州文学，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必要的回顾

贵州五、六十年代的作家队伍，由来自老解放区的作家（如邢立斌等）、原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如蹇先艾等）以及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所组成。建国以前，贵州作家在全国文坛具有影响的仅谢六逸、蹇先艾二人。解放后，这种状况并无太大的改变，可以说，五、六十年代，贵州文坛在全国引起反响的作家及作品似仅有两例：一是石果五十年代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喜期》、《风波》、《官福店》；二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集体创作的形式推出的长篇报告文学《挡不住的洪流》。石果的作品，至今仍具有别人之作难以替代的文学价值，因为它是厚实生活的土壤中绽放的心智结晶。而后一例作品，简略地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民主革命时期麻山、瑶山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二是合作化运动中的“两山”风情，三是“大跃进”的“两山”颂歌。今天看来，正是第一部分的作品以传奇性、地域的奇异性及民族风情使得它今天仍具有文学的价值。第二部分艺术水准平平，实在也因为描写合作化的成功之作颇多，而第三部分则是文学赝品，就在它鼓吹差不多进入共产主义的地方，今天正靠各地支援度贫。这其中的经验是值得贵州文学界认真吸取的。

六十年代初期，贵州文学也有过短暂的活跃，但并未产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以后很快就运动频仍，文学创作出现断档。至于

“文革”时期，更是乏善可陈。

贵州文学的长足进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 我们以为，从知名作家的出现和有影响的作品产生，新时期以来贵州文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 1979年——1984年：似可称为新时期贵州文学的鼎盛时期。何士光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青砖的楼房》、李发模的叙事长诗《呼声》，李宽定的《良家妇女》等系列中篇，叶辛的《蹉跎岁月》、顾汶光的《天国恨》第一卷及《大渡魂》，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等等在全国文坛具有影响，令人刮目相看。

② 1985——1988年：这一阶段已趋之沉静。已享有声名的作家间或有一两篇作品出现，都再也未达到以往高度。汤保华、赵剑平、罗吉万、蒙蒙、袁政谦、唐亚平等青年作家开始有作品问世。增添了几许亮色。

③ 1989——1994年：似乎是一种调整蓄势与萌动勃发交相撞击相携相存的时期。贵州省作协的专业作家或调离，或“下海”，坚持创作的惟余二人。一批年轻人开始活跃于文坛，如潘年芙、戴冰等，起点不低。但这一时期，引起国内评论家瞩目的贵州作家似只有汤保华一人。从总体看，这一时期的贵州文学创作是平实的，与一些省区的文学创作比较，贵州文坛更显得沉寂。

2. 贵州文学美学追求的变异与繁富。

以何士光的创作为例。八十年代中期，评论家雷达曾就何士光三篇（部）作品美学标准的变迁作过考察，欣慰于作家在短短几年从关注现实的《乡场上》，中经剖示生命状态的《种包谷的老人》，到直面社会人生的《青砖的楼房》，虽呈马鞍形的却是应该肯定的回归。事实上，何士光创作多样化的尝试并未停止。近作《如是我闻——走火入魔启示录》，凝视气机，探析奥秘，也许自有其缘由在，或者说是作家心态对特定环境的一种曲折反映，但以艰深文字涉足确乎属于哲学宗教的命题，似很难说是文学的成功。

这种状况，在其他作家身上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也许，在创作的表层意图之后，潜藏着中国文人儒道相杂“出”与“入”相争相谐的动因。

倒是一些新的色彩凝聚在一些年轻人身上。从他们的作品中，难以作出统一的意蕴的概括，或用某一主题简单加以规范。从作家们的创作表白看，或强调顿悟，或崇尚文体，或追求自然，或贴近自我，其共同之处似在两点：一是多着意于某种情绪的营构，倾心于叙述的过程本身。二是叙述的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有别于贵州已有声名的作家，虽然不难看出有某种时尚的影响，却也显示出不应轻视的才华。

因此，我们认为，经过十多年的积蓄，贵州文学的色调已从较为单一走向繁富，已经具备了多种的可行的艺术手段。

但值得思索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如果，现今色调多样的创作趋势，是在深化和发展既有的特色之中的拓展，那就更臻上乘，而事实却未逮人意。各种光辉的色彩一时也引人注目，但冷静观察，却看不出足以欣然的大家气象。

二、贵州文学的基本特征

若将贵州文学置于全国文学的总格局之中，则可看出贵州文学的基本特征。

1. 中心文化辐射之下的贵州文学。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政治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文化交流融汇的历程。边远地区文化的取舍，不能不以中心地区标准为依归。只有“问鼎中原”，才被肯定，才能发挥影响。

就文学而言，事实上，我们对某一作家成就的衡评，常常也是以诸如是否引起全国评论，是否获全国性的大奖，作品是否上了全国性刊物等等为依据。

由于文化中心的强烈辐射，使得边远地区要出文学名家颇为困难。与占尽天时地利的中心地区作家相比，关山阻隔、处于边隅的作家不能不企盼“中心”的垂青。如果说新时期以来，贵州能出几位名家，除了他们自身的才气之外，很大的因素是“天时”——其时百废待举，文学断档，机会相对均等。待到近年来文化运作机制渐入轨道，边地作家欲在全国成名就更为艰难。这也就是为何后来贵州有不少年轻人的作品，水准虽超过本省几位名家的“出道”之

作，却引不起轰动的原因。对这种现实，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贵州文学界在具体的文学操作上还表现出如下的现象：

(1) 贵州同类作品的出现，客观上往往成为中心地区文学运动的遥远回声。

例如，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几位作家推出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中经洪峰、马原等人，后又有格非、余华等人参与；继而又有“新写实”，近来又是“新体验”、“新状态”，热闹纷纭，意气不凡。这些文学思潮、文学形式的此升彼伏，操作者尽可依己长择善而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别人已早作他图尽有尝试之时，我们方才未加消化，不察己情而一味依葫芦画瓢蹒跚学步。试想哪一种文学思潮不是别人已经由热闹归于沉静，而在贵州才泛起些许波澜？

(2) 刊物的风格，追随中心地区有影响的刊物。

一般而言，贵州作家在有影响刊物发表作品并不太多。本地有影响的刊物在编辑方针上向中心地区有影响的大型刊物看齐，这在稿件取舍、栏目设置等方面都体现出来。例如《山花》，请名家做主持人，特邀撰稿，体现编者渴望贵州作家贵州刊物“登龙门”的良好愿望。

2. 迄今为止，贵州文学的成就是由短篇小说所创造的。

“五四”以来，蹇先艾的成就主要是短篇小说，五十年代的石果亦然。

新时期以来，具全国影响的贵州作家何士光、石定的成名作也是短篇小说。但若与中外短篇名家众多的成功之作、高质量集束式的集子相比，贵州作家作品的量少，显得格局不大。

3. 贵州当前的文学创作匮乏有影响的作品。

最近三年，贵州作家在有影响的《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乃至《收获》、《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作品的仅何士光、余未人、伍略、汤保华、石定、赵剑平数人，且评论界的反应大体是平静的。这种状况，与陕西、湖南、上海等地作家的创作相比，显出这些省区作家们持续的创造活力。贵州作家仍在寻找新的突破点，但这种艺术转换的时间确实显得过长了。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言，贵州顾汶光的历史长篇小说《天国恨》目前仍只有第一卷。

而湖南的长篇历史小说已大步向前取得成就，北京凌力等人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一部比一部好。尽管近年王鸿儒有三部历史长篇问世，但比起这些地区的作家作品显然还有距离。

4. 就总体而言，贵州作家仍是区域性的作家。

上述论证实际已表明这一结论。能在全全国性刊物发表作品者仅有数人，获全国性文学奖的也只数人，被权威性理论著作论及的作家毕竟稀少。有的作家（如已调离的叶辛）的影响其实是凭籍另外的艺术载体作媒介。因此，我们认为贵州作家队伍，在总体上仍是一支地域性的队伍。

三、贵州文学的主要不足及其原因

对这一问题，仅从创作主体方面进行探析。

1. 文化素养不足。

所谓不足，并非是指贵州作家是否拥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凭。文学创作需要特殊的才智。我们所说的不足，是认为贵州不少作家的作品明显存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现象，一些作品仅止于发表而已，实际形成读者漠然、评论界淡然的局面。与贵州老一辈的作家如谢六逸、蹇先艾的学养和雍容大度相比，今日贵州作家中底蕴不丰盈者并不鲜见。整体素质离“学者化”相距颇远。应该指出，学者化是说所创作的作品的文化意蕴应是博雅的，是体现中华悠久文化源流的，是饱含时代风采的，是深得天地灵气山川芳泽孕育的美文，是令人赏心悦目乐于回味的华章。

2. 哲学底蕴欠缺，美学标准模糊。

哲学与美学属于不同层次的学说，在文学创作中，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关联。

所谓哲学底蕴不足，不仅是表现在作品对客观世界的艺术把握的深度，而且还体现出贵州一些作家甚悔“少作”的现象。尽管，这作品曾给作家带来声名。这并不完全是某种制作“效应”的策略。例如顾汶光《天国恨》续作的难产，在一定程度上就存在有作家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发生变异的因素。

贵州文学，从蹇先艾的《水葬》、《贵州道上》，石果的《风

波》到何士光的《乡场上》，都有着直面人生的精神，是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去发扬光大的。何况人世济世，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道义所在。又何必悔其“少作”，浅表地追随某种时尚？

贵州作家在创作思想上所表现出的哲学底蕴的欠缺，与所追求的美学标准的模糊，还可从如下两种状况看出：

一种是以以为文学的进步唯一依赖的是文体的变革及叙述方式的革新。推向极端的结果，便是在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呈现出主体意识过于张扬的现象。表现为语言缺乏节制，叙述琐屑的毛病。常过份夸大个人的感受，花费颇大的篇幅营构一种情绪。读此类作品，第一次可能新鲜，第二次会差强人意，到第三、四次就不免感到某种矫情造作。或者说，此类作品学到了先锋小说的某些皮毛，却缺乏形而上的思想力量。

另一种是主张贵州文学走地域文化的路子。粗看似也在理，以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其实，在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保持某种地域文化特色是可能的；而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文化中心地区的强烈辐射，使得封闭的文学运动要发展极为困难。主张走追求地域文化特色的创作路子，易犯的毛病之一就是胶柱鼓瑟、不求变通。本来，贵州的地域文化实在是不够典型的。黔北，算得贵州人才荟萃之乡，历史也算久长，但方言、习俗、生产方式等等却都是巴蜀文化一系；黔西北、黔西南等地，深受滇文化影响；黔东又是荆楚文化一脉……此外，此类创作往往流于遗风佚俗的描写，而轻忽人们为改变生存状况的辛勤努力。许多情况下是对某种生存状况的描摹，看不出历史与现实交汇引起的心灵的波澜，也就没有展示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以至人们往往说，贵州文学的风格是阴柔之美，其实是未看到地域的封闭所造成的文学格局的狭小，以及渐无生趣的艺术上的陈陈相因。

四、促进贵州文学发展的思考

(一) 提高创作主体的整体素质的关键所在

1、重塑健康的人文精神，培养浩然之气

一段时间以来，在贵州文学界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不该忽视的。

文坛“无主调，无主将，无主题”之类现象，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贵州文坛。前文所论的种种问题，从不同角度表明我们的认识是有着充分依据的：

对社会进步的呼唤，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一直是数千年中国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这种精神是不容否定的。

近代以来，对民主与科学的渴求，也是一直是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重要旋律。多少志士仁人艺术地表达着相似的襟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多么豪迈，“我以我血荐轩辕”又是多么炽烈！这样的精神在今天也是正该发扬的。

应该明了，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作家，和其他阶层人士的区别，恰在于应该具有一种对人类社会进步进行终极关怀和思考的精神，一种在喧哗与骚动的俗流中钟爱自己精神家园的清洁志趣，一种视写作为生命的敬业品格，一种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平常心态。

2、呼唤崇高，焕发关注社会、走向历史的激情

我们强调呼唤崇高，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的艺术风格加以排斥，而是以为时下琐屑平庸之风侵袭文坛，非历史、非英雄的世俗气充斥刊物，玩世不恭、自嘲自谑的痞气在某种程度上被奉为时髦。时下的文坛实在太需要展示伟大历史进程中悲欢离合英雄气的黄钟大吕，实在亟需博大、雄伟、壮观、慑人心魂的艺术力量。

而呼唤崇高，作家显然需要具有关怀人民、热爱生活的情怀，有着让人们读了他的作品目光会变得远大起来的追求，这就有着一个发扬新时期以来的既有成绩和贵州文学的传统，并更加深化的问题；有着一个年轻作家走出“自我”、包容世界，使创作逐渐大器的问题；有着一个摒弃某些自然主义的琐屑描写，关注作品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问题。

关注社会、走向历史，也并非着意味主题先行，或者是只能有此模式而排斥其他。而是认为，我们的作品应该展示，在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生存状态的深刻性，刻划心灵震撼的巨大波澜，描绘形形色色遭遇，揭示表层之下的内在必然。对贵州的某些作家而言，似乎紧缺的还不是才气，而是亟需灌注激情，重树继承中国

文学优秀传统的信心和责任心。

(二) 寻找繁荣和发展贵州文学的突破口

1. 选择中篇小说的创作凝聚和锻炼艺术力量

前面所述，为贵州文学争得荣誉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而短篇的创作要成气候，一是作品的艺术力量及思想容量，二是要以系列的篇幅体现作家系统的艺术见解。对此，贵州作家大多显得认识不足。

而长篇小说，不仅是指作品的篇幅而言，更是指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以艺术表现上的自成系统及思想容量的深刻取胜。新时期以来，贵州文坛推出的现当代题材的长篇小说，能予人以深刻印象的甚少。有的长篇，只是字数的拉长，有的缺乏叙事的更新，停滞在过程的描述。凡此种种，都说明有必要继续集聚力量。

由此而论，中篇小说便以其艺术的可容量可成为最佳的选择。

选择中篇，并不意味畏惧长篇，而是一个根据实情蓄势待发的举措，待艺术力量勃发，长篇的成功就是水到渠成。

2. 走出散文创作的误区

贵州的散文创作较前有大的进展，但缺乏在全国有影响的名家（即使是个别水准较高的作家也因作品不丰而影响知名度）。从整体素质看，贵州散文水准不高。散文的创作更是真学识真性情的体现。总的状况看来，虽然散文创作走出了昔时“杨朔式”或“秦牧式”的习惯思维，但某种“青春情绪”的煽情之作又太多，不少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显得相当单薄。

我们希望在散文这个领域写出作家的真胸襟，展现独特的个人魅力，以更多的视角，艺术地表现出时代的气息。从特定的角度甚而可以认为，倘若贵州散文创作真正发展了，那贵州文学的水准也就真正提高了。

3. 报告文学必须摒弃创作中媚俗的恶习

作为文学与新闻相契合的报告文学，从本质上是重再现而反虚构的，真实性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新时期以来，贵州报告文学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一些作品甚有影响。近年以来，报告文学作品不少，但影响甚微甚而在相当程度使人产生厌读情绪。其重要原因，在于

拜金主义恶趣的肆虐。报告文学作者倘若变成谁出钱就去写谁、就歌颂谁，还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言。

也许，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上，文学的真髓与世俗的诱惑冲突更明显，选择更为艰难。但无论如何，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在摒弃恶俗之后才能产生。我们认为，报告文学的创作应该走向历史的真实和深沉。

4. 诗坛更需黄神大吕

贵州诗艺的革新是有目共睹的。女诗人唐亚平的作品就是明证。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我省诗人所取得的成绩。但与此同时，诗的“沙龙化”倾向也日益明显，与广大读者的疏离是客观的现实。近年发表的诗作，可认为主要是某种自我情绪的宣泄，致使诗的影响力日益缩小。新时期以来，李发模的《呼声》之所以曾受好评，其中浸润的强烈现实主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可以认为，倘若诗人只关注“自我”，那诗的境界必定是狭小的。

5. 繁荣真正的文艺评论

新时期以来，贵州文艺评论有长足进展，一批新人脱颖而出。曾有的几家理论刊物也团结了一批理论、评论家。但近年来，文艺评论也甚为因顿。原因似在如下几点：一是不少人辍笔，有的同志改攻创作；二是几家文艺理论刊物停办，理论文章难以发表；三是科学的评论及批评还亟待提倡；四是不少人视文艺评论为可有可无，认为其作用只在烘托气氛或造一点什么声势；五是贵州文艺理论界的素养，从整体上看还不够强大。

文学的繁荣，离开了评论是不健全的。贵州文学界，需要有真知灼见、风格独具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只有促进了文艺评论的真正繁荣，贵州文学的进步才能获得强大的助推力。

（三）政策的倾斜及相关的措施

1. 对重点作者及有明确创作规划的作者要加强扶持。

文学的全面繁荣不能只靠几个专业作家，贵州文学应有强大的后备力量。以往贵州作协有聘请专职创作员（为期壹年）的作法，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据悉，有关方面也准备对有明确创作规划

(经论证切实可行)者,在经费、时间等方面予以支持,这是适时之举。此外,尚可以破除某些习惯的约束,及时组织召开一些有特色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有计划地“推出”文学新人,造成贵州文学阵营层层递进之势。

2. 适当调整刊物结构。

在马列文论的经典著作中,有过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不一定平衡之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事实是,贵州的经济不够发达,而贵州的文学刊物的构成与几个毗邻省区相比也是最弱的。例如,四川、云南、湖南等省都有(或近年新办)大型文学刊物,而贵州则无。别的省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都有十余种之多,而贵州仅为4家。不少省区有几家通俗文学刊物,贵州则削减为零。这种构成,显然不利于贵州作者队伍的组织与培养,也缺乏有影响的阵地以扩大贵州文学的影响。以通俗文学而论,文学的全面繁荣本应将其包括在内,但我省迄今没有一块园地。应当适当调整贵州刊物的构成状况,以使贵州文学健康地为兴黔富民服务。

3. 考虑建立作家版权代理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存在。经济浪潮对文学的影响是极大的。出版社出书必定考虑图书市场情况,而由于发行渠道上的弊病,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出版困难重重。

写作是一种个人的创造。但面对市场,一般作家的适应力显然是不够的。而有组织的行为则可在相当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可考虑依正常程序设立作家版权代理机构,专门推出贵州作家的优秀作品。认为凡“纯”文学的作品都要赔钱的认识是缺乏科学分析的。据悉,四川就有这样的文学机构,一些优秀作品正是靠集团的力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市场,并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 不必亦步亦趋仿效某种时尚,在推出贵州文学新人的策略上应另辟蹊径。

先有某种理论而后以制作的作品来印证它的正确,这种作法违背创作规律;一些作品的匠气也表露着某些理论的不足。我们以为,

即如“新体验”、“新状态”等理论口号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学的策略。仔细观察以致合理借鉴都无须疑虑，但全盘引进则大可不必。总结以往数十年贵州文学发展的经验，实在不必亦步亦趋追随某种时尚，而应另辟蹊径，更扎实地扶持，推出贵州文学新人。譬如，前述“版权代理”就是一种推出贵州文学新人的思路。

贵州新文学已经走过四十五年征程，成就显然，不足也是客观存在。我们强调成绩，为相对落后的贵州毕竟数次在全国文坛“夺魁”而欣喜；而缕析不足，则是期望贵州文学能又一次腾飞。

我们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应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下一世纪的到来。我们已经有一支逐步成熟且在发展壮大文学队伍。而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说不是凭一点小小的炫耀性的技巧就可以最终取胜的了。决定性的因素是作家的人格精神和他的丰富学养，以及独到的生存体验。这正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竞赛。我们有信心坚持，也有能力创造更好的成果。

贵州的造型艺术

一、迅速发展屡创新成绩

如果不把民族民间工艺算在内，贵州的造型艺术在解放前种类是极简单的。近代以来，在全国有一点声誉的，只是国画领域里的姚茫父、邱石冥、袁晓岑、谢孝思等几位黔籍画家。直到抗战以降，一批文化名人如徐悲鸿、丰子恺、闻一多、李宗津、董希文等在贵州的艺术活动，包括教授学生，才催发了贵州造型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但主要也还是限于国画、油画等数样品种。

解放后，贵州造型艺术有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但由于长期强调艺术为政治、政策服务，片面追求宣传效果，故造型艺术中宣传功能较强的品种如门画、年画、壁画、版画、连环画、宣传画、书法等发展较为突出，而其它品种则相对受到冷落。贵州造型艺术真正的全面蓬勃发展，当属“新时期”以来。随着“文革”的结束，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的落实，一大批老艺术家焕发了青春，活跃起来。如宋吟可、孟光涛、方晓石、王树艺、田宇高、秦元魁、蒙绍华、陈恒安、涂月僧、王萼华、刘承权等。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创作来带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培养新人。进入八十年代，一批曾活跃于六十年代及艺术院校毕业的中年艺术家如董克俊、蒲国昌、田世信、刘万琪、廖志惠、马正荣等，大胆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局限，在高扬“反传统、”强调“艺术个性”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艺术探索。接着一批更年轻的艺术家如尹光中、曹琼德、刘雍、范新林、王平等加盟，终于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寻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从1984年11月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的《1、2、3、4造型艺术展》(尹光中、田世信、王平、刘雍四人联展)开始，到1989年3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曹琼德绘画艺术展》，贵州艺术家先后在京举办了十余次个展或联展。终酿成轰动一时的“贵州现象”。以至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月刊于1990年第六期还推出了《“贵州现象”面面观》特辑。

与此同时，贵州油画的崛起也十分突出。八十年代，全国各高

等艺术院校毕业或进修后来贵州的一批青年画家如李昂、任小林、曾希圣、成肖玉、贾静丽、赵华、赵竹、黄伟、谢啸冰、刘晓、陈晓光等，以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几乎奇迹般地迅速改变了多年来贵州油画极为落后的局面，创作出一批高品位的油画作品。1987年10月，中国首届油画大展在上海开幕，贵州即有七幅作品入选，李昂的《苗女》获这次大展的最高奖。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贵州油画又有九幅入选，其中任小林的《五色天地》获铜奖，进一步肯定了贵州油画实力。此外，一批中年画家如张正刚、吴光鼎、张以玉、张世申、饶湘平、巫子强等，也在对过去“反思”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探索，在老一代油画家秦元魁、李自由、向光等苏俄写实画法与青年一代前卫意识之间，找到一种有自己特点的道路，从而使贵州油画队伍更为厚实。

同属西画的水彩、水粉画，在八十年代也成绩斐然。老画家田宇高、林发荣、殷树成，陈其心等，与青年画家吴光亮、田军、郭达平、黄清等互相学习，共同探索，形成了贵州水彩、水粉画专业队伍。他们最突出的成绩在于技法上的革新，吸取了中国水墨技法，还使用洒盐、对印、揉纸、涂蜡、刀刮等新手法，使这一画种更为丰富多彩。

我省的漫画、连环画、插画在八十年代也曾一度十分兴旺。老画家周发书、杨国勋、叶景文、曾健雄等及雷瑞之、安裕荣等青年画家，创作出不少思想性很强的漫画作品。连环画、插画虽无专业队伍，但亦有相当数量的画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在第六、七届全国美展中均有不少作品入选，青年画家谌宏微的《生命的痛处》在第七届美展还夺得铜牌，其它如董克俊、钱筑生、龙康华、吴家华、刘雍、周矩、黄涛等人的作品，都曾引起不小反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省文联的《刺梨画刊》对此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它为许多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发表园地，在全国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八十年代末它的停刊，致使贵州的这几个画种从此一蹶不振。

国画是贵州美术界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画种。宋、王、孟、方四老且不谈，在八十年代，人物画方面，杨国勋、宋剑锋、杨抱林、黄天虎、陈敦品、钱文观等都有较大的建树；花鸟画方面，鲁风、